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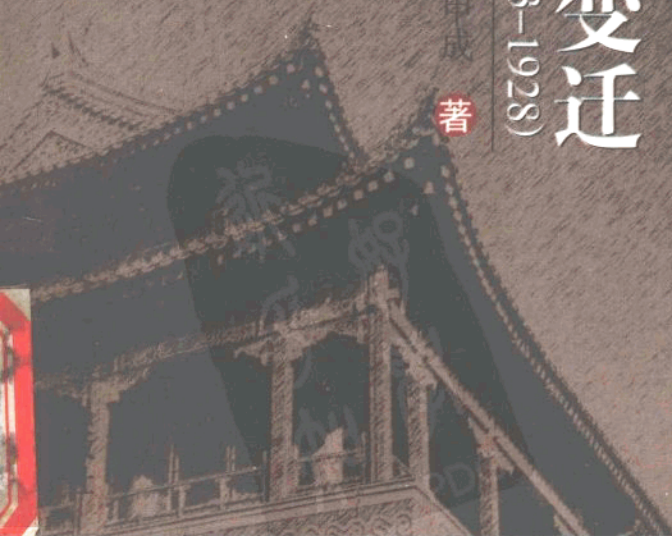
直隶商会

与直隶社会变迁

(1903-1928)

孙学军 孙炳芳 王甲成

著



前 言

本书是 2000 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的结项成果。

国内史学界对商会的研究大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上海、苏州、天津三大商会研究的开展，商会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又一热点。20 年来，商会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专著的发表、专题论文的涌现、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正是商会研究盛况的写照。综观 20 年来国内学术界商会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通都大邑商会，尤以沪、苏、津为著的微观剖析；就是对商会的宏观透视也基本上以上海、苏州、天津商会为蓝本，对于包括城市和农村基层商会在内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在直隶，除天津（1928 年后改称特别市）商会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外，对农村基层商会鲜有研究；而把直隶商会作为一个整体，置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大环境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分析该区域社会中城乡商会组织的建立、相互关系、活动及其影响，揭示其在直隶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尚属于“拓荒性”研究。

本课题选取“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为研究主题，通过分析直隶商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产生后对直隶社会的影响，探讨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尤其要凸显出商会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方面由传统向近代的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

“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属于区域社会研究，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广泛搜集、查阅档案、期刊、地方志资料以及调查资料，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城市学、人口学、计量史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注

意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尽可能地加强与苏、沪区域商会的比较研究，以便更好地突出直隶商会在社会变迁中的地方特色。

本课题在时间断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1903-1928），但不拘泥地划死，根据需要适当前溯后延，立意在于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而言是巨变和多事之秋，也是直隶商会最为活跃的时期。章开沅先生在为虞和平所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商会稍能奋发并体现独立品格的岁月，多半是在中央政府衰微或统一的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的时期，及至相对稳定与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它反而堕为附庸，隐没独立品格，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论断是对中国商会整体发展状况的分析，无疑也切合直隶商会发展的实际。直隶商会为我们探讨直隶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较佳的透视点。

在地域范围上，根据需要对直隶省区略作技术性修正。明清以来，直隶省地方行政建置变化频繁。明时，今河北省主要属于北直隶范围。清顺治初仍袭明制，称今河北省所属区域为北直隶，顺治二年（1645年）始改称直隶。其行政建置，依如明朝，领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8府，延庆、保安2直隶州及宣府镇。后行政建置变动频繁。1669年直隶巡抚由真定徙至保定，始定保定为直隶省省会。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延至同治九年（1870年）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令封河，还驻保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直隶总督常驻天津。至清末直隶省共领12府、7直隶州、3直隶厅。其中，朝阳府领县分别属今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直隶州、多伦诺尔直隶厅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列。余11府、6直隶州、2直隶厅所领州县或部分州县，在今河北省，是课题研究重点。因为直隶位居三北（华北、西北、东北）要冲，同周边省区联系密切，基于史实，在研究中也有所延伸。

本课题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创新：

1. 本课题研究将填补直隶商会与区域社会近代化研究的空白。

2. 本课题把直隶城乡商会作为一个整体，加强对直隶区域商会系统网络内在关系的探讨，突破了以往局限于个别城市商会的研究取向。

3. 对直隶商会与区域城市化、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的研究是本课题的难点，也是本课题有望突破、创新的内容。

4. 尽量加强同其他区域商会的比较研究，突出地方特色。

课题主持人：张学军

课题组成员：孙炳芳、王甲成、吴艳杰

作为该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八章，其中，张学军负责前言、第一、二、五章撰稿，孙炳芳负责第三、四章撰稿，王甲成负责第六、七章撰稿，第八章由吴艳杰、王甲成、孙炳芳共同撰写。张学军负责全书统稿、定稿。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	(1)
一、艰难启动的近代化	(1)
二、风雨激荡的资产阶级思潮	(31)
三、危机中的变革	(39)
第二章 直隶商会区域网络的建构	(50)
一、本体系统	(50)
二、直属系统	(71)
三、协作系统	(82)
第三章 直隶商会与近代市场体系的建构	(86)
一、商会与华北近代交通网络的形成	(86)
二、商会与市场体系的内运营	(101)
三、商会与捐税抗争	(118)
第四章 直隶商会与近代区域城市化	(138)
一、商会与城市工业化	(138)
二、商会与城市商业近代化	(160)
三、商会与新型城市网络的初步形成	(171)
第五章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190)
一、商会与商业性农业的新发展	(190)
二、商会与乡村手工业的变迁	(201)
三、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	(221)
第六章 直隶商会与民主政治的缓慢演进	(232)
一、直隶商会权力构成机制	(232)
二、直隶商会的参政活动	(242)
三、直隶商会对政府制定工商政策的影响	(272)

四、直隶商会的政治特色	(277)
第七章 直隶商会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生活变迁	(284)
一、直隶商会与城市市政建设	(284)
二、直隶商会与实业教育	(293)
三、直隶商会与公益慈善事业	(305)
四、直隶商会与商事裁判	(313)
第八章 直隶商会与社会意识的嬗变	(323)
一、忧患意识	(323)
二、开放意识	(330)
三、法律意识	(333)
四、参政意识	(335)
参考文献	(342)
后 记	(347)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

直隶商会正式诞生于 20 世纪初年，到民国初年逐步完成了组织网络的建构和社会整合，成为直隶社会中强大的“在野权力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近代工商社团组织，直隶商会不仅是全国范围内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产物，更是直隶区域社会变迁的结果。作为畿辅重地，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赋予了直隶商会独特的个性。

一、艰难启动的近代化

（一）开埠通商与近代商业转型

1. 开埠前的直隶社会

直隶省（1928 年后改称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北部，京师、天津位居其中，畿辅重地，在全国居重要战略地位。东临渤海，富有鱼盐之利和交通海外之便；绵延的太行山脉成为直隶西部屏障；南部平原，鲁豫毗邻；北部坝上，与蒙（古）相连；东北一隅，沟通关外。直隶在华北、西北、东北（简称“三北”）居于枢纽地位，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直隶在历史上是开发较早的区域。战国时期邯郸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商品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构成赵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北方一大都会。秦汉之际，邯郸城屡遭战火，一度衰落，西汉时又复兴起来，成为黄河北岸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与临淄、洛阳、长安、成都合称海内五大都会。

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成一气，对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到了唐代，永济渠沿岸城市兴起，漕运交通便利，工商业繁盛，人口稠密。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此后，北方一直战乱频仍，我国封建经济重心南移。金元以降，直隶地区成为畿辅重地，这对于直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勃兴具有重要意义。政治中心（在北方）和经济中心（在南方）的背离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明代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品种试种成功，棉花种植范围不断扩展，大大改善了北方的种植结构，对北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明迄清前期，直隶地区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在传统经济结构框架内正稳步发展，走向封建末世的繁荣，并开始出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缓慢演化。

到开埠前，直隶商品经济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变化之一，社会从业结构中工商经营比重增加。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活跃，贫富分化的加深，农村分工分业多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据张岗先生研究，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是农而兼工或农而兼商，虽然尚保留着副业形式，但已带有专业化倾向。另一种则是离乡背井，迁徙到城市或其他地方，从事商业贩运、手工工艺或雇佣劳动，成为专门职业者。例如，束鹿县“人满之区，工于某利，贸易每出万里外”；涉县“贫民无所得食，往往出张家口佣作，有数十年不归者”；又如“京师之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疑‘滦’之误）、蓟州人”。^①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反映了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事实，同时它对扩大社会分工，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前期，直隶民间采煤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京西、宛平、大兴、房山、滦州、井陘、曲阳、磁州、万全、宣化、怀来、蔚州、承德等地，都兴起了煤炭开采业。经营方式，有些是小民自备工本，自行开采，属商品经济小生产性质；有些则是雇工开采，已具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因素。

变化之二，长距离贸易有所发展，商业活动的地域有所扩展。

^① 张岗：《清代直隶商品经济分析》，《河北师院学报》1985.3。

狭小的地方市场已容纳不下商业资本活动的能力，跨地域的贸易流转潜力得以更为广泛的发展，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无不活跃于直隶广大区域，直隶河间府商人也是“行踪达南京、苏州、临清、卫辉、磁州、天津、泊头、真定、沧州、饶州、徽州等地。”^①

变化之三，商业经营内容的丰富。商人活动不再仅限于珍奇异品的交换，在商品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商业资本以日常用品的经营仍能获得较大的发展，如河间府的“行货之商，贩缁，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②

变化之四，天津城市经济功能的加强。天津拥有的鱼盐资源和便捷的水路交通网络以及地处“京师门户”等优越条件，给天津发展国内通商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中叶天津已是南北货物交汇场所，“海船南载于吴松，而北卸于天津，两地为出口入口之总汇，实海运成始成终之枢要。”^③同时水陆商旅也从四面八方麇集天津，使天津市场上货物云集：有闽广的蔗糖、蓝靛、茶叶、海货、珍贵木材、干鲜果品；江浙的丝绸、布匹；江西的瓷器；直隶的棉花、梨、枣；辽东的豆饼等。这些货物除一部分在天津地区销售外，大部分要转往北京及通过海河水系转销内地，或过海销往东北地区。

明清之交，漕运繁荣，作为南北货物集散市场的天津城市又有了发展。据康熙《天津府志》序称：“天津去神京二百里，当南北往来之中，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荟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大都会莫能过也。”但此时天津的政治功能（漕粮事关京师供应）和军事功能（京师门户）远大于商贸功能，清中叶以后，天津城市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以漕粮转输与军事重镇为主转向经济、军事功能并重，区域性商业中心城市地位得以确立。天津同东南沿海

①《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十八，《河间府风俗考》。

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十八，《河间府风俗考》。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复魏制府询海运书》。

及辽东贸易呈发展势头,“商船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南方各地商旅纷纷放舟北上,“始有商贾经过登州,直趋天津、奉天”,出现“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的景象^①。

鸦片战争前夕,浩浩荡荡的沪、闽、粤、浙商船一直活跃在“北洋航线”上,从南方运来的商品可谓琳琅满目:茶叶、蔗糖、毛竹、锡箔、南纸、绍兴酒、明矾、瓷器、棉花、棉布、丝织品、粮食、海货、草席、葵扇、蓝靛、烟草、藿香、松香、翎羽、毛边纸、花梨,甚至还有不少进口洋货,如哆罗呢、羽纱、哔叽、金属品、香料、珍贵木材、洋碗、燕窝、槟榔、胡椒、象牙、鱼翅、玻璃、珍珠等。秋后从天津启碇南归,运去产品有花生、小麦、豆饼、大豆、植物油、杏仁、红黑枣、核桃、药材、木材、瓜子、肉类、人参等,“每年不下一千万担”^②。

南来北往的大宗货物汇集天津,天津成了“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的商埠了,出现了如“若停交一年,将南方货物不至,北方之枣豆难销,物情殊多未便”的局面^③。由于进口洋货的北上,开埠前天津已经出现了经销洋货的“洋货局”。

清代前期,直隶商品经济确有很大发展,不过对其发展水平不应过高估计,因为粮食生产普遍表现为自给性质,家庭手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作为小农自给的必要补充。商业贸易也没有突破传统经济框架,虽有相当部分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还是以布易粮,通过小范围的调剂,用于自我消费,如乐亭县“以布易粟,实穷民糊口之一助”;平乡县“女务织杼,贫者鬻粗布以食”;宝坻县“贫者多织粗布以易粟。”^④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统治地位。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②《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八《户政》。

③姚洪卓主编:《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④乾隆《乐亭县志》卷五;《平乡县志》卷五;《宝坻县志》卷七。

从全国范围看，经过清前期 200 年的惨淡积累，直隶商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较同期江南地区仍落后许多，甚至不及山西。当晋、徽、粤、闽各路商人足迹几遍全国时，安土重迁的畿辅“臣民”却鲜有作为。直隶区域的商业贸易属于国内贸易，并以短距离贸易和乡村集市贸易为主体。虽然天津在开埠前已经成为北方巨埠，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依附京师这一特殊的政治优势而被动形成的，天津市场商品主要是南北土特产互通有无，纵使洋货有所挟带北上，也只不过是点缀而已，天津商业贸易属于典型的国内埠际贸易，在封建经济格局中，不过是一种扩大了自给性市场体系。

2. 开埠通商与直隶新式商业产生

直隶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跨出封闭的内贸型市场体系，实现同世界市场的对接，是以直隶社会日趋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以社会经济正常发展道路被阻断为代价的。

近代直隶的通商口岸有三个：天津、秦皇岛、张家口。天津在开埠前就成为北方巨埠，1860 年开埠后成为直隶乃至华北地区对外贸易的枢纽；秦皇岛是作为天津运煤辅助港口，由清政府于 1898 年自开为商埠；张家口地处西北，开埠已是 20 世纪上半叶，对直隶社会影响甚微。天津开埠通商是直隶社会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从时间上讲，已经晚了东南沿海近 20 年。当东南沿海欧风劲吹、上海魔术般崛起时，直隶才开始自身痛苦的蜕变。

天津开埠通商“沟通了华北传统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的联系，即开始了华北传统农业生产的商品价值体系与代表西方大机器生产的商品价值体系的对话”^①，拉开了北方传统的自然经济被现代资本主义掠夺与征服的序幕。直隶坐拥天津，外联蒙、

①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6 页。

晋、鲁、豫，商路汇集，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是天津开埠辐射区域的第一级扩充和必经之路。开埠后，各具不同使用价值的外国商品越来越多地通过天津输往华北各地，同时中国北方特有的农副产品也因世界市场的日益需求而不断得到发展。既然天津是华北对外贸易的枢纽，因此其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反映着华北尤其是直隶卷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程度和速度。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见下表 1-1^①：

表 1-1 1865 - 1906 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简表

单位：海关两

年代	进口总值	出口总值	总 值	进出口差额
1865	11 852 437	1 704 916	13 557 353	- 10 147 521
1866	16 583 457	2 687 962	19 271 419	- 13 895 495
1870	16 188 609	733 577	16 922 186	- 15 455 032
1873	15 946 800	1 256 573	17 203 373	- 14 690 227
1878	18 818 692	1 954 787	20 773 479	- 16 863 905
1883	18 349 345	3 317 666	21 667 011	- 15 031 679
1888	24 208 777	3 750 240	27 959 017	- 20 458 537
1893	32 609 200	5 960 947	38 570 147	- 26 648 253
1894	37 412 806	6 864 248	44 277 054	- 30 548 558
1895	41 068 882	9 158 924	50 227 806	- 31 909 958
1899	61 903 755	15 700 807	77 604 562	- 46 202 948
1901	39 257 317	10 154 106	49 411 423	- 29 103 211
1906	91 039 247	21 825 308	112 864 555	- 69 213 939

注：“+”出超，“-”入超

^① 参阅苑书义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9 页。

通过对上表分析可知，天津进出口贸易有着两个特征：

第一，对外贸易不断发展，无论进口抑或出口，无不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进口总值从 1865 年的 11 852 437 海关两，到 1906 年增至 91 039 247 海关两；出口从 1865 年 1 704 916 海关两，到 1906 年增至 21 825 308 海关两。天津对外贸易，虽几经波折，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

第二，进口总值始终超过出口总值，是近代天津外贸的显著特征。1865 年进口总值超过出口总值 1 000 余万海关两，1878 年入超额为近 1 700 万海关，1895 年入超为 3 190 余万海关两，1906 年入超接近 7 000 万海关两。

贸易入超并非都是坏事，如果输入的商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国家建设亟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料，这种入超则无可非议，也就不存在入超所产生的恶果。然而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是在中国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出现的，作为低开发的中国被强力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外贸的入超，蕴藏着严重的危机，是西方列强对华进行掠夺性贸易的体现，直隶区域的对外贸易也不例外。长期入超和入超绝对值的增加，反映了外贸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贸易色彩，直隶区域首先是作为西方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步入近代的。

下面我们将对天津开埠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加以分析，见表 1-2^①：

表 1-2 天津港 1863—1898 年进口大宗商品量值表 单位：海关两

名称	单位	1863		1873		1883		1893 ^②		1898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棉布	匹	202 316	1 018 222	2 881 044	5 054 296	2 958 549	6 322 653	9 798	34 915	247 791	453 008
棉线	担	—	—	456	22 805	—	—	—	—	1 963	119 243
毛呢	匹	932	1074	11 694	782 594	29 338 ^①	439159	759 ^②	6 943	—	—
棉纱		—	—	—	—	—	—	2 728	61 408	61 905	1 042 524

①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 178 页。

续表 1-2

名称	单位	1863		1873		1883		1893 ^⑤		1898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数量	价值
日本茶及茶末	担	2 915	20 110	3 709	20 379	3 393	17 536	14 299	53 759	—	—
糖	担	41 732	274 645	3 595	12 403	84 613	377 573	169 669	931 260	346 817	1 711 315
鱼介及海产品	担	15 324	92 008	62 506	241 433	44 254	364 614	21 016	133 893	18 796	229 374
药材及香料	担	1 868	412 390	13 406	113 225	7 461	159 707	8 639	168 050	6 542	146 548
玻璃	箱	5 412	22 930	10 648	40 462	20 144	41 982	—	—	—	—
火柴	罗	131 263	105 010	79 665	63 732	182 815	135 179	409 218	218 945	2 449 743	456 424
煤油	加仑	—	—	—	—	398 340	63 734	—	—	—	—
五金	担	3 014	15 744	16 257	139 605	110 702	384 632	13 496	65 921	22 233	50 355
针	千个	—	—	886 586	177 544	—	—	268 225	32 326	—	—
鸦片	担	3 749	2 285 651	498	301 326	2 451	937 966	10	11 730	9	13 500
机器	—	—	—	—	—	—	56 265	—	20 559	—	351 068
铁路材料	—	—	—	—	—	—	—	—	590 763	—	2 345 756
木材	担	—	—	17 145	70 616	—	—	—	20 552	—	—
其他	—	—	2 017 368	—	2 228 259	—	989 571	—	2 082 266 ^④	—	2 067 157 ^④
总计	—	—	6 275 221	—	9 768 679	—	10 290 571	—	4 433 290	—	9 110 272

资料来源：天津海关历年贸易报告

表注：① 包括毛制品 844 打。② 担。③ 包括政府军需 1 315 273 两。④ 包括政府军需 459 087 两。⑤ 除 1893 年所列量值均为直接进口外，其他各年均包括自其他口岸转口输入数字。

天津进口商品中，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鸦片占有极大比重。1861 年进口鸦片 1 482 担，1863 年进口 3 749 担，价值 2 285 651 海关两，占当年本埠洋货进口总值的 36.42%，1865 年升至 5 654 担，占全国进口鸦片的 7.4%，1866 年更高达 9 162 担，价值 5 768 169 海关两，占当年口岸洋货进口总值的 33.4%。但是这一年棉布进口超过鸦片而跃居首位。及至 80 年代以后，天津鸦片

输入开始减少，1898 年输入仅 9 担。鸦片进口锐减，主要导源于印度鸦片价值剧涨和国产鸦片大量涌现。

在鸦片进口锐减的同时，洋布、洋纱、毛呢及毛制品、糖、五金及其他商品进口额不断增加，棉布、棉纱进口激增，开埠后，天津很快成为全国重要的洋布输入和集散中心。在 19 世纪下半叶，天津进口洋货总值中，洋布竟占了一半以上，天津洋布输入始终占全国洋布进口总数的 1/4 强。例如，1863 年天津进口洋布 202 316 匹，价值 1 018 822 海关两，占当年洋货进口总额的 16.24%。到 1883 年，棉布进口已达 2 958 549 匹，价值 6 322 653 海关两，占当年洋货进口总额的 61.44%^①。据有的学者计算，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当时直隶、山西两省每人做三件成人衣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天津进口的洋布，已基本占领了邻近省份的市场^②。

天津洋纱进口起步较晚。19 世纪 60—70 年代，天津洋纱进口在进口总值中尚不足 1%，从 80 年代开始，天津洋纱进口量成倍增长，到 90 年代末，洋纱平均进口量已达 20 万担，比 70 年代末增长了 250 多倍，这一时期天津洋纱年均进口值已占洋货进口总值的 10% 以上，年均进口量已占全国洋纱进口总数的 10%^③。

天津进口的外国商品，除了在天津消费一部分外，大部分销往广阔的天津腹地。

1868 年天津海关税务司休士对天津进口洋布、洋货去向曾做过一次详细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天津除了向直隶省供给外国进口货之外，还是下面这些城市的中转站——我尽量根据它们从天津获取供应量的大小排列如下：

山西省：太谷县、路安府、太原府、汾州府、平阳府、大同

① 参见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第一期。

② 张思：《十九世纪末天津的洋纱洋布贸易》，《天津史志》1987.4。

③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 173 页。

府、蒲州府、朔平府；河南省：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山东省：临清州、东昌府、济南府。有少量货物去往陕西省的西安府、同州府、兴安府。余者去往蒙古的西南部。”

当时天津进口洋布、洋货由如下几条运输线运到各腹地：

由大清河向西到琉璃河镇，然后沿琉璃河到北京附近的地区。

由大清河一直向西到达保定、定兴、高碑店地区。

由子牙河往南，行到与滹沱河汇合处小范镇，分几路分散。其中一部分沿滹沱河、滏阳河进入直隶中部、南部各府县（冀州、顺德府等）；更大部分在小范镇由河船改装上大运车去往山西方向，在获鹿再次更换运输工具（骡子、骆驼驮运）运往山西太谷县。

由大运河南下，到山东西部、直隶南部各州府，在临清溯卫河直到河南北部地区。

此外有一部分洋货由骆驼运经通州去往张家口，一小部分或船载或畜驮运往京东各府县^①。

关于天津进口洋货腹地分配情况，以下两组数字可见一斑。1902年度津海关发放的子口单内的货物，“共值海关银二千七十四万二千七百十五两，但该价值内百分之六十八成半（按即68.5%）运往直隶；百分之十六成运往山西；百分之六成运往山东；六成运往河南；二成运往甘肃；其余则运往陕西、奉天并俄属之西域及蒙古等处。”^②1906年度天津“在整个海关的外国产品输入额三千六百一十七万八千零一十九海关两之中，分配给消费地区的情况，大约开列如下：

直隶省：22 120 293 海关两。

山东省：1 420 579 海关两。

山西省：6 578 933 海关两。

河南省：1 165 426 海关两。

陕西省：152 465 海关两。

^① 参阅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74页。

^② 吴弘明等整理：《津海关报告档案汇编》（1889—1911）下册，1993年印本，第115—116页。

甘肃省：1 453 153 海关两。

土耳其斯坦（按：指新疆）：138 188 海关两。

盛京省：857 416 海关两。

吉林省：3 531 842 海关两。

蒙古：700 海关两。

黑龙江省：2 049 海关两。

恰克图：34 270 海关两。

以上是在‘子口单’之下通过海关的外国产品。虽然足以了解它的大体分配情况，可是没能包括输入内地的所有外国产品，此外还有在海关输入的外国产品。”^①

上述材料表明，天津进口的外国商品主要销售地区是华北的直隶、山西，而直隶始终占居首位，山西名列第二，其他省区比重不大。

天津在外国商品大量输入的同时，本国商品出口也渐趋兴旺。详见表 1-3：

表 1-3 1861—1898 年天津出口商品数量变化^①

商品名称（单位）	1861 年	1866 年	1873 年	1878 年	1880 年	1885 年	1890 年	1893 年	1898 年
杏仁（担）	……	……	3 505	6 090	……	6 600	8 285	1 695	2 894
豆类（担）	86 456	41 060	12	——	……	44 100	114 623	——	——
猪鬃（担）	——	——	——	——	——	3 351	4 219	——	——
开平煤（吨）	——	——	——	——	——	17 486	47 243	——	——
红枣（担）	2 988	21 501	19 994	19 280	229 911	32 830	27 592	962	1 930
乌枣（担）	3 421	15 301	14 262	10 199	14 217	27 568	31 753		
鹿茸（对）	88	3 004	3 715	——	5 119	3 846	4 700	——	——
药材（海关两）	……	……	247 998	27 464	……	318 011	407 035	893	2 963
大黄（担）	426	64	521	——	700	1 073	1 277	——	——

^① 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室编，1986 年印本，第 274—275 页。